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
〔美〕林恩·亨特
〔美〕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刘北成 薛绚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

[美]林恩·亨特 著

[美]玛格丽特·雅各布

刘北成 薛 绚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 世 纪 学 术 译 丛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

【美】林恩·亨特

【美】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装帧设计
曹春

(京权)图字:01-98-1001

Copyright © 1994 by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and ZHENG ZHONG PUBLISHING CO.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版权由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所有。中文简体字版由让·V.纳加尔文学代理机构和正中书局通过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真相/(美)阿普尔比(Appleby, J.)等著;刘北成,薛绚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5

书名原文: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ISBN 7-80109-218-X

I. 历…

II. ①阿… ②刘… ③薛…

III. 史学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748 号

历史的真相

乔伊斯·阿普尔比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87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定 价	21.50 元

中译本前言

这是一部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可以断言,对它感兴趣的读者范围肯定会超出史学领域。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笔无疑是它的一大优点,但更引人入胜的是它广阔的视野和新鲜的论述角度。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它不是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罗列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教科书式的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因此,在这部不太厚的书中,包含着美国史学史、美国(乃至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史和美国社会政治史的众多侧面,还包含着历史哲学的思考。

正如本书中所说的,讲故事之所以吸引人,

是因为它总是从结尾开始。那么,《历史的真相》这部著作之所以吸引人,也是因为它是从结尾开始,即它是从今天西方思想界面临的一个基本困惑开始,这就是“现代性危机”。所谓现代性,按照本书的解释,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性概念里面包含着一系列的概念,其中包括现代的科学和真理的概念。作为一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

人们常说,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把历史学与“真理”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本身其实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话语。首先,历史与文学艺术分家,被确定为一种求真的知识,是19世纪的事。其次,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模式,把历史学建构成一门科学,也是19世纪的事。这两件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近代自然科学(主要是以牛顿科学为代表)的“客观中立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科学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是真理的保证。

从那以后,历史学的科学性一直是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加固的。

从那以后,尽管历史学的“科学性”不断地受到质疑,但是直到本世纪中期,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

更广义地看,由于科学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历史学追求科学性不过是整个现代化大潮中的一个表征。

本世纪中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以及现代科学进行了解构。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中立性”神话被打碎了,而且自然科学的“客观中立性”也变得可疑。新的研究证明,牛顿在创

立经典力学和达尔文在创立生物进化论时,不仅没有哪怕暂时地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其“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建构因素。

科学性的本原一旦受到破坏,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就陷入真正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福柯甚至声称,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也都是“虚构故事”。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盟进而与真理的联系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种来势汹涌的相对主义思潮,《历史的真相》的作者以自信的态度对历史学的价值作出肯定的回应。

这部著作涉及到许多东西,读者会各取所需。这里简单地谈几点想法。

首先,《历史的真相》针对相对主义思潮所作出的回应不是出自传统史学研究者的立场。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二战后在美国教育膨胀时期进入学术殿堂的,都是女性,都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时期,都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影响。她们在书中毫不掩饰这种经历。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她们不想以超越的“客观中立”的立场自居。因此,不难理解,她们会对现代人对史学的批评和多元文化主义给予正面的评价。

其次,《历史的真相》一书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与美国史学的关系都作了分析性的论述。正是由于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激进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洗礼,三位作者不是把美国史学及历史哲学的替嬗看做是“理性的进步”,而是注重分析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史学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和哲学—社会思潮变化。更准确地说,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是史学的背景,史学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思

潮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种角度看,受过唯物史观熏陶的中国读者在读这本书时会有一种亲切感。

最后,三位作者的结论并不是放弃史学的求真功能。她们提出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以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本书的结论涉及到现代知识论的根本性问题,即不可能完全中立的知识与真理的关系。务实的实在论颇带有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味道,令人难以满足。但是,本书提出的问题及其思考会对我国的读者有所启发。

刘北成

1997年12月15日

绪 论

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其他国家上过大学的人都多。因此美国人应该而且也确实知道很多东西。可是,几乎人人对自己知识的价值和真实性都不大有把握。在历史知识方面尤其是如此。以前美国人曾经把一套单一的国史故事接收下来,视之为自己的历史传承。如今,族裔文化、种族、性别方面经验的多样性越来越受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美国的丰功伟业故事可能只是掩饰少数精英权力真相的沾沾自喜之辞。历史的科学基础与文化基础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历史本身也就从这两个根基开始动摇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加了四倍以上,从 1947 年的 233.8

万人,增至1988年的1304.3万人。尤其明显的是,女性在学生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9%增至54%。到了1988年,大专学生总人数的19%是有色人种。^[1]新一代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特别是以往被排除于美国较高文化生活阶层之外的族群的学生——对于知识界普遍承认的美国历史论断不以为然,对科学推论出来的、自19世纪就占尽优势的客观知识,也并不肃然起敬。原来只是一小撮哲学家特有的怀疑态度,现在已经广泛流传,迫使教师们对于自己传授的知识道统也感到难为情。西方文化的哲学性基础,就要出现大裂隙了。

我们三人是美国高等教育空前普及化的产物。与另一些人一样,我们当初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走入学院生涯。我们一直感受颇深的是,往往有人以所谓的客观条件为由,排斥我们充分参与国家公务。类似的遭遇,其他女性、劳动阶级人们、少数民族也都有过。然而我们却也乐见,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探究问题方式,使受排斥的人有了这纠正不公平待遇所必须的利器了。

等到我们这一代学生长成,并担任大学教职,人们对于以前所确定的事实抱有的那份信心,几乎已消失殆尽。大家不再认为任何形态的知识——包括历史——均可套用科学的探索方法,也不再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肯定都是好事,而且多多益善。价值中立的科学曾经言之成理,而且提供了不断进步的希望。如今,在思考缜密的人眼中,却似乎不可能有无须争议而又启迪人心的美国史实,也不可能只有益而无害的科学进展。高等教育对我们(女性、劳工阶级、少数族群)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以往受教育者曾经赖以巩固信念的思考原则。

只要在当今美国大学教过课,而且被学生以礼貌的言语或态度告知:“老师,这是你的看法!”就会晓得,从美国历史的蕴义

到科学的价值,怀疑一切乃是时下的通例。即使学生们没把这个意思表明,但现在已有一派新的哲学家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都与你当时的立场相关,你当时相信的事就变成真理。因此,凡事都要看你的社会活动空间让你处在哪一个“阵营”。

本书将针对当前认为价值观与真理探求是不确定的说法展开论述,一并讨论在民主式教育条件下关于客观知识、多元文化、政治必要性等方面现存的争议。讨论以历史为重心,特别要问一问,人们从过去所知道的事有哪些是有助于解释现在的?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对于事实真相的怀疑态度与相对主义,已从持续民主化的美国社会崭露头角,不但在科学方面如此,在历史学与政治方面亦然。高等教育几乎向所有前来叩门的人开启;美国历史按多种不同文化视角重写;科学作为一切真理的源头和模式的地位被推翻;这些是相互关联的现象。它们差不多同时发生,并非偶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十年间,科学、符合科学的历史、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历史,这些知识的绝对主义原则都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几乎像是总结前的中间报告——是战后这一代建构的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录、以族群或性别认同为着眼点写的历史。以前由英雄、天才、政治家——都是秩序与既有现状的表征——稳稳主宰的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现在挤入了妇女、少数民族、劳工。战后这一代已经质疑前人经思考认可为合理的固定范畴,也让以前假定是恰合人性的社会行为不再显得理所当然。身为这一代的成员,我们总不免要问,而且是愤愤地问:这些想法说法,究竟符合谁的历史?谁的科学?谁的利益所需?诸如“人们(men)是……”、“科学当然

认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以表达普遍共同意见自居的语句,都要遭到挑战。

有些批评者否定教育民主化的冲击将宣告西方文明死亡,我们却认可这种民主化所启发的顿悟与观念修正。在本书里,我们支持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对于那些已奠定从多元文化方位探讨人类历史的基础的研究工作,要给予喝彩。但是,对于伴随当代相对主义的愤世态度与虚无主义,我们则予以屏弃。我们企求,看历史的眼光与看现在的态度都能够不断促进社会民主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必须使当前关于国家历史、科学严正性的争议面对人类对过去的认知能否做到真实而客观这一问题。

于是,许多问题浮现了。美国人需要历史知识吗?如果需要,要谁的历史?目的何在?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看,历史必定是宣传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前都是受过教育者觉得显而易见的,如今却不然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历史一向不是像今天这么具有争议性的科目。在前共产主义世界,奋起的人民推倒了列宁与其他威信扫地的英雄人物的雕像,历史教授与教科书被指为彻底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污染而被一并抛弃。高压政府(不论左右)一旦失掉政权,人民就迫不及待要找出这政府曾经胡作非为的历史证据,借以加强自己重建国家的意愿。

由于历史和历史证据对于一群人的认同感有关键性意义,证据本身时常会变成争斗的焦点。某些团体极力否认当年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确有其事^[2],就是一个实例。“历史复查学会”(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view)在美国各大学报刊和专业团体组织刊登广告,要求进行研究,以反驳纳粹曾对欧陆占领区

内犹太人有计划地灭种屠杀的事实。这个组织背后的人把他们的论点公之于众——姑且不论是多么奇特的论点,用的手段是:使用含有客观意味的机构名称(“某某学会”听起来自然比“新纳粹、反犹太人宣传组织”之类显得中立),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谎言一旦以印刷品重复发表,或是在广播中多次出现,就会渐渐变得好像是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

有关历史研究的目的及责任的一般问题中,上述例子是一个极端。在美国,近来历史方面的争议集中于学校教科书。批评者细读各级学校使用的历史课本后,认为它们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怖。据他们说,这些教科书颂扬死去的白种欧裔男性的成就,却不表彰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受压迫排挤者的贡献。它们强化了种族与性别方面最坏的陈规陋习,而不是在帮助青少年超越这些陈规陋习。现在已经聘用了一些新的作者,要从被认为更符合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视角重新撰写历史。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支持者被指责为霸道的宣传家,说他们在乎的是有政治动机的解释路线,而不重视事实真相。他们被说成是,故意夸大少数族群的贡献,牺牲了公正立场与国家认同应有的常识,只为了要使少数族群不感到自卑。政府机关委员会、专业团体讨论会、官员们发表了各种报告,结果使民众困惑、恼怒、狐疑。历史应该用来激发族裔文化自豪感吗?抑或历史应该传授有关往昔的客观事实?历史必须一再重写以消除种族与性别的刻板印象吗?抑或历史应该超越当今混乱的政治社会议论之上?传授一贯的国家历史是民主政治必须的吗?抨击传统的历史意味着以愚昧颠覆文化的阴谋吗?这将贬抑知识、反对探求真理吗?

还记得历史课的成年人(记得那一大堆年代、事件、人名,但不曾讨论过族裔文化、国家特性问题者),见到为历史研究引起的骚乱,也许会觉得奇怪。当代相对主义的两难困境似乎把历史学拖入了厮打冲突。每个群体、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真理版本吗?不同的历史叙述都同样可信吗?如果事实真理是依作者的处境而定,历史学者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作者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看法。怀疑主义(skepticism)既是一种求知方式,也是一种思考角度。自古希腊时代起,对于宣称的真理表示某种怀疑就一直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态度。怀疑的态度可以助长求知,也鼓励人保持开放的心境,相信自己也可能有错。但全盘的怀疑却是成事不足,因为它使人迟迟不敢判断、下结论。

怀疑主义其实就含在西方文化的骨髓里。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似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怀疑论。启蒙运动领袖之一狄德罗(Denis Diderot)曾说:“一切事物都需检验,一切都需过滤筛选。没有任何例外,不怕伤谁的感情。”在狄德罗宣布的新时代里,思考的人必须“无情地践踏”过所有旧的传统,向每一种思考障碍提出质疑。^[3]自那时候起,没有所谓既定前提,也没有不容质疑的事,先贤经典、圣经、教会或国家的教诲,都没有例外。

相对主义(relativism)是怀疑主义在近现代的一个必然结果,认为一句话的真理性只是与说这句话的人所处的地位相关联的。相对主义使人不相信能发现真理,甚至不相信有真理这回事。由于它不相信人能在追求真理时先跳出自我,因此就直接质疑所谓客观的理想境界。假使真理取决于观察者的立足点,怎么可能有超越的、共通的、绝对的真理?退而求其次,怎么

可能有让所有族群历经许多代都相信的真理吗？我们要指出的是，有关往昔事物的事实真理——即便不是绝对的——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也是值得去奋斗追求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其骇人的新型武器与纳粹政权的灭种屠杀政策，一度阻断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前进去路。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似乎显示，绝对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文化的相对主义在死亡营里无用武之地。不过那只是暂时的。疑惑再度逾越良知的抑制，向西方哲学的箴言进逼。1945年原子时代展开，重大科学与强大政府关系日趋紧密，这些使科学的无私性受到质疑。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反越战示威，开始让人质疑科学家、决策者、教授们能否不受各自在种族与政治上偏见的影响。生态学家抱怨，现代科学借进步之名发明了大规模破坏的机械，工业则在污染环境。20世纪的西方文明已经产生了技术空前高超的灭种屠杀。进步、民主、客观知识、现代化似乎不再是齐步走向造福人类的目标了。

我们不是在提笔哀叹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成功。我们和别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两种态度调教的。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前，我们在大学里谋得第一份工作，那时美国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系里罕有女性任教。因此，我们算是化外分子，有敌意的人颇不甘愿见到我们闯入学术殿堂。我们曾亲眼目睹而且参与推翻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偶像的行动。受过“合乎科学”方法训练的我们，曾向一脉相承的传统欧美史观挑战，进而对于科学所谓的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真理与公正的客观性提出质疑。在20世纪哲学家影响之下，我们曾用新的理论来挑剔关于历史运行方式的旧的哲学假说（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现传统的说法有不周之处。不妨实说，我

们重塑理解历史的方法时，曾以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为工具（有人会说是当做武器）。

但是，我们认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双刃剑。它们可以用来对付当权者，迫使他们放宽接纳之门，却也可能伤害一心要追求任何知识的人。使用这两个利器的人会说，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断言，科学只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或只是一系列语言上的约定俗成，是以数学密码制成的一套繁复的权力游戏，目的在于确保西方独霸地球资源。

我们要超越这种怀疑主义，同时要以多元文化的方位来理解我们这些美国人与西方人，详细考察过去与现今历史学者撰写历史的方式。因为要确认科学、社会变迁、国家方针等方面史料研究的成果，我们接受两边的挑战，左边是相对主义者，右边是卫护过去状态(status quo ante)的人士。

我们认为，有关历史的公开辩论中的一些问题，凡是愿意读一本这方面相关书籍的人都能明了。如果一般人对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感到不解，历史学者至少应负部分责任。我们历史学者早该负责说明我们在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事值得去做。其实不明白历史的地位和角色的不只是一般人，许多历史系大学生也不甚清楚历史学者的职业是什么，老师们讲的那些是怎么学来的。不用说，高中的情况更糟，因为高中历史课常常被归入社会研究课程之下。而且，各级学校的历史课通常被视为在传达某个主题内容，而不是在培养思考历史的方式。

还有一点，也许是最令人忧虑的一点，专业史学者已被彻底社会化，只顾符合发表论著的要求，无暇也无意去参与关于历史

工作意义何在的辩论。例如,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探究历史真相究竟有多重要,历史对塑造国家的特性有何作用,这两个在本书中占有很重分量的问题,时常被历史学者认为与其工作不相干。而他们认为相干的则是研究档案文献、撰写学术论著。至于相对主义、真理、客观性的问题,都留给历史哲学,或是留给少数对这类题目特别感兴趣的史学家,通常是思想史研究者。许多历史学者以为,只有具专精知识的人可以辩论这些题目,即便他们都承认有关历史与科学、小说、国家特性之间关系的争执早已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了。我们并不要表示自己优于以前避开这些辩论的历史学者;因为我们也是从同样的职业文化走过来的。但我们希望鼓励更多人参与讨论关系到每个人的课题。

本书的主旨简明直接,却也颇为远大。我们希望使一般读者、历史专业的学生、专业历史学者意识到,有关历史与科学真理、客观态度、后现代主义、认同政治等的关系已引起激烈辩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过程,希望能导出不同的答案。我们都不是历史哲学的专家,只是各自经历过某个领域的研究训练,现在要凭这个背景来分析 20 世纪晚期有关历史的一般性争论。

我们采取一种包容立场,但我们的论点仍可能得罪某些人,实在是因为现今的文化环境使人动辄得咎。这种环境气氛乃是政治光谱两极的尖刻批评营造出来的。自从启蒙思想家与神职人士较劲的时候起,西方知识界活动就普遍存在着文化冲突。文化趋向分歧既是常态,发表讨论文化问题的书,当然不可以妄想一片风平浪静。好在西方世界已不再有焚书(或烧死作者)的事,虽然拉什迪(Salman Rushdie)^[4]的案例测验了出版者、书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度。

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